

容闳政治人格分析

郭颖

[摘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为中国近代化而奋斗毕生的先驱者。他在 80 多年的忧患生涯里,一直密切关心并积极参加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容闳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他自幼就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文化熏陶,他的政治人格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人格,较少依附性,较多独立、民主、自由、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取向。其政治人格最突出的是:融合近代精神的爱国情感、积极的革命意识、民主的价值取向。这些特征已明显带有现代性,具有公民政治文化的色彩。分析容闳的政治人格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建构和政治人格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参照。

[关键词] 容闳; 政治人格; 政治感情; 政治意识; 政治价值

[作者简介] 郭颖,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6 级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 D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9)11-0160-06

容闳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和外交家。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青年时代的容闳虽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但他仍深深地眷恋祖国、家园和亲友,并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富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留学选择学校、选择专业、毕业后的择业等个人经历的重要转折中,他始终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的是能够服务祖国、对国家有用。正是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他在毕业回国后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以及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容闳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他自幼就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文化熏陶,他的政治人格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人格,较少依附性,较多独立、民主、自由、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取向。容闳的政治人格已明显带有现代性,具有公民文化的色彩。

当代中国正在步入现代社会,政治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现代政治人格的树立与普及则是政治现代化得以达成的重要政治文化条件。这个过程与公民文化的建构以及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相辅相成的。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当前中国公众的政治人格表象仍然存留着传统人格特征,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本文通过容闳政治人格的分析,就是企望从中得到某种借鉴,为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建构以及存在的政治人格现代化转型提

供历史的参照。

本文拟从政治感情、政治意识、政治价值等三个层面就容闳政治人格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政治感情——融合近代精神的爱国主义情感

“政治感情是人们在政治生活、政治关系中依据自身感受所引发的内心评判以及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环境的内心体验。政治感情是‘融通性政治心理’,它将政治认识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也将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联系起来。”^{[1](P70)}一般来讲,政治感情具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

容闳幼年就在西方人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方文化教育,因而,他的政治感情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容闳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公民文化色彩;他关爱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容闳的爱国情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益强烈。他曾经说过,自己在被西方教育改变其内在气质的同时,其“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其苦心孤诣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是“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法”^{[2](P39-40)}。容闳的美国友人评价他

对祖国有着“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2] (P173)}。

在容闳生活的时代，爱国情感在许多仁人志士身上都有体现。对于容闳而言，他的爱国情感具有某种原发性。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其自发形成的爱国情感得到了极大的升华，上升到充满理性的高度，因而较之同时代的仁人志士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理智。容闳的爱国情感与他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和领悟的近代精神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批评清朝的腐败，树立起革新中国的意愿

容闳通过中西方政治、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对比，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清朝的腐败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从而坚定了革新中国的意愿。容闳曾十分明确地谈到西方教育对其认识中国国情的作用：“予当修业期内（指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作者注），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知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2] (P31)}这种“负荷”与“感觉”遂使容闳下定了决心，要将西方“文明之教育”推行于中国，使中国文明富强起来。

1856年，即容闳回国的第二年，他在广州亲眼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镇压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粤人之暴动”（即洪兵起义），而残杀了数万民众的刑场。当时血流成渠，尸首遍地。他痛感“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即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2] (P61-70)}。

几年之后，容闳亲自对太平天国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分析这场革命之所以爆发，“恶根实种于满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2] (P98)}。他虽然对太平天国本身非常失望，但认为它仍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2] (P99)}。

由此可见，容闳完全没有把清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把太平天国视为大逆不道的暴民，而是以人道和正义的标准来衡量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对抗，回国之初就认清了国家和民族与腐败政府之间的界限，他所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之后，容闳在较长时间内不得不与清政府打交道，但这不过是为了实施他的救国计划。容闳的这种政治情感基调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后来的维新运动及反清革命关头，他选择了维新派的立场，对革命派也深表赞同。

(二) 坚决主张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容闳的爱国情感与近代精神相统一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他依据所了解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和知识，坚决主张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作为一个中国人，容闳对近代中国以来贫弱不振、屡受外国欺凌的现状是十分痛心疾首的。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欲免欺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振作起来，坚决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2] (P122-124)}正是本着中国人应该自振自强的精神，容闳身体力行，竭其所能，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计献策。针对“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的险恶境况，容闳曾在向清政府呈递的条陈（此条陈为容闳请人代写）中，提出“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词讼”以保护“我自有之主权”的建议^{[2] (P131-134)}。

容闳勇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最突出的事例是调查秘鲁华工情况，阻止华人被卖“猪仔”。调查之前，容闳与秘鲁来华募工的专使谈判。秘鲁专使开始花言巧语，企图诱使容闳同意订约。容闳对华人被卖做苦力的种种“奴隶牛马之惨状”早已屡见不鲜，他痛陈事实，直言告知秘鲁公使自己决不能同意订立这项“野蛮之条约”，而且还要大力阻止此项“大背人道之贸易”。紧接着，容闳被派往秘鲁调查华工的实际情形。他迅速行动，三个月内完成了调查任务。除了写成报告书外，为了使证据确凿，他还秘密摄下了华工被虐、“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的照片二十余张，终于使期望订约的秘鲁专使“噤不能声，垂头丧气而去”，而清政府亦“遂以华工出洋著为禁令”，卖“猪仔”之祸有所减少^{[2] (P147-148)}。

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而发生争端，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颇不直日本，非以祖国之故有所偏袒，其实曲在彼也”，因此战事一开，其“爱国心油然而生”，连续写了两封信寄往国内，向政府方面

提出了两条“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直至无穷期而力不竭”的方策：第一策是向英国借款，用来继续与日本作战；第二策是以台湾岛作抵押，向西无论何国借款，用作再战的军费^{[2] (P158)}。这种“借款之策”当然不是什么好办法，真若实行，恐怕后患无穷。但从容闳极为关切祖国危亡、坚决主张抵御外侮的态度中，不难体会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七年之后，容闳在台湾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子爵重提此策，表示“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2] (P120)}，可见其爱国之心丝毫不改。

容闳的事例告诉我们，在爱国与“西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恰恰相反，像容闳这样高度“西化”之人，正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才得以在爱国的情感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能够更自觉、更有价值的为维护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尽心尽力。

二、政治意识——积极的革命意识

“政治意识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政治关系中处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意思反映和意识活动过程。”^{[1] (P77)} 政治意识包括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三大要素。政治意识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认识部分，它对政治文化的其他层次都具有指导作用。

容闳的政治意识与其同时代人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容闳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又加之其自身所具有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他的政治意识包含了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的色彩，以革命意识最为突出：他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富强、自主而积极奔走，主张中国在政治上进行根本的变革。容闳不但自己提出改革中国的根本主张，他还曾经访问太平天国、参与洋务运动、投身维新变法、促进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容闳是第一个提出必须对政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时值 19 世纪 50 年代末，他就能用近代史观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他说：“革命之在中国，故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累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和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3] (P77)} 在这里，容闳指出中国要从两千年的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根本改革都是不可缺少的。

容闳认为，“国体上和政治上”的根本变革，必须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的这种政治革命思想萌发于归国之初，出于他对清政府残酷镇压广东人民起义的愤怒。当时，容闳“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后来他虽然认为太平军的失败是必然的，却也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贡献。“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唯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3] (P82)}

嗣后，容闳置身洋务活动多年，对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些人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视曾国藩为“清代第一流人物”，光绪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不过，他对清政府的腐朽本质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尊自太后，贱及胥吏，自上而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欺诈机关矣’^{[3] (P80)}，因此，容闳坚定地认为，在中国，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必不能免。19 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容闳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国体上和政治上”革命时机的到来，他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一边，视孙中山为中国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给革命以最真诚和最实际的支持。

(一) 访问太平天国

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容闳耳闻国内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深表关注，请求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及时向他提供有关情况。学成归国后，容闳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平军者与地方民众的惨景：“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3] (P82)} 他“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对洪杨起义军深表同情，甚至“几欲起而为之响应”^{[3] (P82)}。

1860 年 11 月，容闳由两名美籍传教士陪同，离开上海，前往苏州、丹阳、南京等太平军辖区参访。此行既出于他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同情心，也是他个人意欲有所作为的主观动机使然。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和他在《圣经》、耶稣等方面有着共同语言，藉此或许能寻找到实施其教育救国方略的途径。

容闳一行于 11 月 18 日抵达南京，12 月 24 日持护照离开，逗留了 36 日。容闳见到了干王洪仁

环,并通过他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在这七项建议中,第二、三、六、七条均与教育有关,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宗旨。洪仁玕尽管见识颇广,总理朝政,其实并无实权。容闳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于是,容闳谢绝“义”字王爵离开了太平天国。

(二)参与洋务运动

经过多次失败,容闳仍然矢志不渝,声称“予既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4] (P68)}。1863年,经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好友的推荐,容闳的才能得到曾国藩的器重,走上了筹办洋务维新中国的道路。他与曾国藩合作,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首次在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成批机器设备。曾国藩在与西方列强交战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列强屡败大清帝国,惟一的原因是军事装备技术的差距,而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只有引进先进国家的科技和设备,这才是实现强国的捷径。1863年12月5日,曾国藩在赠友人的信中写道:“鄙意欲乘此闲暇,购器募将,试造轮船……以为远谋。”^{[3] (P113)}当时,安庆大营虽然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科技人才,但大部分人没有出国经历,能担当出洋购器重任的人,非容闳莫属。

第二件,倡议建立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应用之法”。曾见到各种新式机器运转及生产的场面,非常高兴,容“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2] (P120)}。他说得很清楚,办学目的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国工业化,逐步达到人才、机器全部自给,不仰外国;招生对象为中国青年;教学内容为机械制造、工程理论及试验等学科。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教学方法又能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符合科学造就人才的基本要求。“文正极为赞许,不久遂得实行。”^{[2] (P135)}

第三件,倡议派遣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容闳视其教育计划“为最大事业,以报国之唯一政策”^{[2] (P123)}。他要通过培养人才,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到中国。1868年,容闳通过丁日昌首次将其久怀于胸的“教育计划”写入《条陈四则》,向清政府陈请。主要内容有:组织合资轮船公司;选派聪颖子弟,送往国外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等。他说:“此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2] (P123)}后来因多种原因,计划受挫。容闳就将希望转向曾国藩,并恳请丁日昌“常向总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2] (P123)}。

1870年6月,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办教案,丁日昌等协办。天津教案的处理,因中方缺少称职的译员,有时不得不依靠洋员而徒增不少困难。容闳利用这个事实,积极进行活动。后来曾国藩领衔,四大臣合奏,支持容闳的“教育计划”。同年冬天,该计划被清廷批准。容闳得此消息,喜而不寐,乐称:“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 (P126)}1872年夏,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赴美。此后连续四年,每年派出30名青少年赴美国留学,共120名。

然而不久,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以担心青少年生活方式西方化、无益国家为借口,决定全部撤回官派留学生。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这对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时,他认识到依靠洋务派来维新中华,终难成事,必须从根本上实行改革。从此,他与洋务派分道扬镳。

(三)投身维新变法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反对割地求和、拒签《马关条约》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在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提出“变法”主张,发起了维新运动。

1896年,容闳结识了康有为与梁启超,遂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刊载了容闳关于银行钱路的几乎全部章程和条陈,大力宣传。1898年4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容闳也积极参与。“百日维新”期间,他在北京的寓所成为维新派议事的中心。“一时几变为维新领袖之会议场”^{[3] (P102)}。康、梁等人也拟将一些重大事项交由容闳办理,推荐容闳赴美借巨款,以作为修筑全国铁路、练百万精兵、购铁舰百艘、广设新式学校以及开设银行等统筹大局的费用。

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后,容闳积极参与营救同志的谋划。他致函李提摩太,请求营救梁启超,同时他自己也被迫逃至上海租界避难。在上海,他继续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慨然纠合同志,组织“中国强国学会”。1900年7月1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当时参加会议的各地维新派代表人物八十余人,公推容闳为第一任会长。

(四) 赞许革命

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反思了自1855年归国以来所经历的挫折和打击,对清政府的政治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腐败的清政府是不可能实行任何改革的,它已成为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容闳原来想依靠清廷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渐趋破灭,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另谋良方。

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到香港避难,曾经在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他们是同乡,又都胸怀大志,于患难之际不期而晤。两人一见如故,彻夜交谈,纵论古今,颇有相见恨晚之慨。他俩畅谈了发动反清革命、谋求中国民主自由的理想,互相勉励要为中国的发展奋斗不息。经过交谈,容闳对孙中山的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助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6] (P115)}而孙中山对容闳这位有新思想、热心中国改革的老前辈也敬慕不已,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两人由此建立了相知之谊。

1901年,容闳再次到了美国。他继续关注国内态势,积极活动,争取华侨和美国进步人士同情并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促成各种政治力量的联合,壮大反清阵营;鼓动宣传,号召人们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积极筹募款项,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

从上述容闳的政治意识看,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进人物之一。他一生备遭艰辛,却始终坚定而乐观,始终顺应历史潮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毋庸置疑,容闳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

三、政治价值——民主的价值取向

“政治价值指政治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能够满足自身政治需求并对政治对象具有评价功能的精神范畴。作为深邃的理性认识,政治价值属于政治文化的高级层次,它是衔接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得力角色。”^{[29] (P186)}政治价值的要素有正向与负向之分:正向政治价值要素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公平与人权,其中民主属于基本要素,处于核心地位;负向政治价值要素主要包括专制、独裁、强权政治等,其中专制属于基本要素。

容闳的政治价值观属于民主政治价值取向,又有其独到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要求开启民智、实现政治上的平等

容闳深切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实现政治革

命,推动中国发展,促进内因即民众的改变是首要的;而要想改变民众、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必须通过教育。但是,中国的封建教育不能实现这一点,他转向西学,推动留学生赴美。

容闳批评封建教育使人“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精神与活泼之思想。”^{[1] (P135)}他提出幼童出国留学计划,明确表示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为国家储备人材”,希望通过培养一批既有传统忧患意识,又有现代民主思想的人材,实现救国强国;他认识到教育的启蒙作用和知识的力量,把教育计划“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3] (P116)};他强调要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科技,以此“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思想”^{[3] (P182)}。可见容闳的着眼点在于希望通过开启民智,使内因产生变化,继而有望使国家富强。因此,容闳主张派遣留学生也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学习西人之“长技”,而是要通过他们“为中国谋福利”。

(二) 要求政治上的民主

容闳在政治上致力于近代民主,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在他的一系列改造中国的实践失败之后。从这些实践经历中,容闳认识到:仅仅发展实业、改革教育制度,是不可能使中国达到繁荣富强之境的,因此,“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3] (P145)}。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要建设近代化国家,教育是重要的,发展工业及其辅助产业也是重要的;但是,若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改革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行,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他决心以西方的政治标准对中国实施改造,革新中国。

(三) 近代人权观念

容闳自幼生活于西方社会,惯与友好的西方人士平等交往。故对“华夷之辩”的观念以及“迷信而顽固”的盲目排外行为,他都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但在他心目中,民族的自尊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西方人以强暴“伤中国人感情”者他必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归国之初,容闳在上海曾两次奋起反击西方狂徒之凌辱。一次逼使逞凶的美国商船船员登门谢罪;另一次则当场把一苏格兰流氓打得“唇鼻立破”,流血破面而逃走。当时,像容闳那样敢于和西方人直接对抗的人并不多,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容闳由此痛感国人缺乏近代人权观念,“每受外人无礼之待遇,辄隐忍退让,不

敢与较”^{[2] (P76)}。为此,他认为必须对国人进行近代人权观念的教育,让“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2] (P76)}。

可见在容闳的政治价值观中,平等、民主、人权等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占主体地位。他的民主的价值观念应是从西方借鉴而来,这与他的经历有关。在他看来,民主就是人人具有自由、平等、人权等意识。这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观念,但确实一定意义上给当时陈腐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容闳的政治人格与传统的依附型政治人格有所不同,这正是我们建立现代政治人格所提倡的。而促成容闳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他较早地全面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上接第 66 页)难”^{[9] (P80)}。要建构政治权威的理想状态,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正视执政和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真正将人民各方面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

要提高政府德政绩效,必须完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促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应从评价的主体、内容、保障等方面规范政绩评价行为,实现干部政绩评价的法治化与科学化,保证正确的政绩观落到实处。党和政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自身的现代素质,以民为本,以制度建设为杠杆,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提升经济绩效的同时,要重视民主化、公正、社会和谐程度、生态环境等目标,扩大政治参与,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建设同时推进,不仅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减少因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形成的“成就缩小效应”,增强民众的承受力,避免产生对政治体系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大力构建公民文化,给公民创造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参政空间;同时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只有当民众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知识、参与技巧和技能的时候,他们才会对自己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充满信心;才会增强政治人格中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 [1] 孙正甲. 政治文化学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3] 容闳. 容闳自传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 [4]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Q].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6] 刘禹生. 纪先师容纯甫先生——世载堂杂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责任编辑: 周志华]

的排斥心理,从而有效维护政治权威。

[参考文献]

- [1] [美] 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2] [美]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3] 钱向阳. 政治权威在道德效力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J]. 四川大学学报, 2007, (5).
- [4] 王乐理. 政治文化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5] 胡伟. 合法性问题研究: 政治研究中的新视角 [J]. 政治学研究, 1996 (1).
- [6] [美] 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M]. 曹沛霖,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周志华]